中欧关系研究简报

第八期

2013 年 4 月 28 日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主编：张利华

编辑：王　亮

目 录

【中心快讯】

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FAFAL 博士短期讲学……（3）

早稻田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Paul Bacon 教授来本中心访谈……（3）

【研究成果】

法国 2012 年大选中的左翼政党：一种理论阐释……郇庆治（3）

中国与大国关系影响因素探析……漆海霞（13）

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未来……田 斌（28）

世界民粹主义趋势透析……史志钦（33）

英国政府主导“第二次城市化”……田德文（35）

进退两难的救助方案……陈 新（37）

纠结在民主与欧元之间的意大利……陈 新（38）

选举变为市场拍卖，欧债危机暴露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困境…… 史志钦（39）

【学术园地】

“中国-欧盟：文化与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袁 帅（40）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立场”学术研讨会综述…… 许宛伶（42）

“中东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与发展”学术报告会综述…… ……许宛伶（43）

[中心快讯]

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FAFAL 博士短期讲学

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的邀请，波兰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Rafał Ulatowski 于 2013 年 4 月 3 日—15 日来我系讲学。他做了“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立场”、“中东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波兰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等专题讲座，与中国学者展开了讨论。受到与会师生的欢迎和好评。

早稻田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Paul Bacon 教授来本中心访谈

2013 年 4 月 1 日—2 日，日本早稻田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Paul Bacon 教授就“中国知识精英如何看欧盟”这一话题访谈了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史志钦教授和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两位教授就 Paul Bacon 教授提出的若干问题予以了详细回答，并与 Paul Bacon 教授商谈了今后双方开展学术交流，学生交换项目等问题。

[研究成果]

法国 2012 年大选中的左翼政党：一种理论阐释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载于《学术界》2013 年第 2 期

【内容提要】从总体上说，由“执政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仍可以（有助于）解释法国 2012 年大选的结果：相对糟糕的执政政绩尤其是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表现，再加上并不成功的选举战略和不怎么有利的政治机会环境，共同决定了萨科奇及其领导的中右政党的败选或奥朗德及其领导的社会党的成功。对这次大选而言稍显特殊的是，伴随着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崛起而日趋明显的左右平衡政治的“右翼化”并不能保证温和右翼政党的竞选连任，而经济危机/困境的总体背景使得主流政党的竞选纲领及其政策主张更难以动员起获胜所必需的充足数量选民，结果是极端性小政党生存空间和政治平衡能力的空前增加——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的两轮投票选举体制下，而主流政党因势利导

地调整竞选策略和利用变化着的政治机会环境就变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竞选连任的最重要条件是能够根据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适时制定/调整契合选民意向的竞选策略，否则的话，那些相对客观性的变量比如执政表现和执政周期压力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笔者在几年前曾提出了一个分析选举政治的综合性框架[①]，即通过考察执政党的政绩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来判断其在即将到来大选中的最可能结果，并将其应用于对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等在 2002 年前后大选中表现的分析。一方面，这一分析框架仍是非常粗线条的，大概只能较好地说明上述三个变量影响力的相对变化——尤其是选举战略相对于政绩表现重要性的上升，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十年之后的欧洲选举政治正由于不断蔓延着的经济/主权债务危机而发生着深刻变化。就此而言，2012 年举行的法国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个例，那就是，究竟应如何从理论上阐释社会党开局不利却大获全胜的大选结果，而这一选举结果又给予我们哪些理论上的启思。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将首先考察三个不同选举阶段（境况）下的竞选情势走向，然后在此基础上尝试得出一个更为综合精确的理论阐释。

一、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一场旗鼓相当的竞争

尽管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就已出现的对两大主要政党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差别[②]，但更为理性的一种判断恐怕是，法国选民在 2012 年 4 月 22 日将会迎来一场十分艰难的政治选择[③]：让尼克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连任新一届总统还是由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取而代之，或者说，萨科齐会不会成为第一个未能连任的第五共和国保守党总统，而奥朗德会不会成为一个临危受命而又逆转乾坤的社会党英雄？而从国际视角来说，这将是 2012 年数个世界大国政治权力更迭中的重要一站，尽管它也许远不及俄罗斯、美国以及中国所发生的更重要。

这是因为，从影响大选结果的四个最重要变量来说，政绩表现上过去五年恐怕很难让法国选民感到满意，而且短期内也难以发生重大的利好变化，因而总体上有利于已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反对党社会党人奥朗德，但后者的缺乏执政管理经验对于迷信总统个人能力的法国选民来说又一个明显缺陷[④]；在候选人素质形象上，萨科齐和奥朗德也是优缺点明显，前者很高调张扬，尤其是喜欢以欧盟和世界性政治家的形象自居——大选前不久发生的利比亚战争对于他来说大概更多是赢分而不是失分，后者谦逊平和，容易与普通选民沟通，但却未必就适合当代法国选民的政治口味；在执政周期上，社会党已经自 2002 年起连续在野，甚至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也已缺乏充分的掌权体验，可以说已是名副其实的反对党和在野党，因而

---

① 郇庆治：《当代欧洲政党政治：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7 页。

② 央视网：‘Hollande may win 1st voting round of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20422/109974.shtml,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③ 李其庆：《2012 年法国总统选举》，《国外理论动态》，2012 年第 5 期。

④ 应强：“‘三无人员’奥朗德：无经验无特点未结婚”，参见新华网：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306.htm，2012 年 8 月 21 日。

总体上处在有利地位，但正因为如此，社会党能否组织一次让人感觉焕然一新的竞选就变得十分重要——无论如何，最终结果扑朔迷离的“卡恩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干事、2012 年法国总统选举社会党头号潜在候选人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突遭美国警方的性骚扰指控并被扣押，后又无罪获释）对于社会党的大选竞选组织应该会产生一定影响；在国际特别是欧盟层面上尽管关于萨科齐和默克尔之间特殊友好关系的无数故事版本——比如著名的“默克奇”（Merkozy）的戏称，但那毕竟都是政治故事，况且不同性质政党领导人携手合作欧洲事务的实例很多，很难说默克尔或德国偏好因素对谁更有利。

因而，总统选举前第一轮投票前法国媒体的普遍性预测是，萨科齐和奥朗德两人将会携手进入第二轮竞争——这意味着，他们都不会获得取胜所必需的半数以上选票，但也不太会出现 2002 年那样一方被排挤出最后决赛的极端与尴尬场面；而对于谁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萨科齐侥幸连任还是奥朗德成功翻盘？民调结果大都显示，后者会在第二轮中顺利胜出，从而引导欧盟政治的“左转”风潮[①]，但笔者的看法是，如果上述对四变量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第二轮投票大概还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政治对决，奥朗德并没有轻松胜出的任何资本与把握——更何况，从总体上说，法国政治和整个欧盟政治一样并没有因为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而出现“左转”的清晰政治信号，而且不断年轻化的新一代选民的政治偏好和政治文化就像当今主流政党与政治家一样轻松地穿越于“左右”之间。[②]因此，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政治”和谁是好的“总统”，不仅我们这些“旁观者”正变得迷惑不解，而且广大法国选民这些“当局者”大概也不怎么明确清楚——依此，如果必须做一种“二选一”式的理性抉择的话，笔者甚至觉得萨科齐的胜率更大些。

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后：萨科齐何以会倒下？

到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一天的 5 月 5 日，法国媒体已几乎普遍预测[③]，奥朗德将会以 53%~54%的得票优势战胜现任总统萨科齐，成为 17 年之后的又一位社会党人总统，而萨科齐将不得不接受败选失利的结果。而在此之前，笔者确实还坚持认为，萨科齐也许仍有政治翻盘的机会，其基本依据则是，围绕着上述四个基本变量的理论分析并不支持一种“一边倒”的选举胜利，而且我们也确实看不出欧洲主流社会包括法国政治文化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向左转向的明确迹象。但至此已十分清楚的是，这种基本面与法国选民的当下政治意愿并不吻合，那么笔者的初期选情研判“错”在何处，或者说，我们需要做哪些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呢？

---

① Wikipedia,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nch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2,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② “法国希腊政坛大风吹　欧洲政治方向左转”，《联合早报》，2012 年 5 月 8 日，参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13/fincrisis120508a.shtml；沈孝泉：“奥朗德当选总统 法国一片‘玫瑰红’”，参见 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592.htm，2012 年 8 月 21 日。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单纯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希腊极左翼政党力量的崛起也未能改变其主导性的政党格局与政府构型，相反，结果是主张欧洲一体化和施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新民主党及其联盟在第二次大选后上台执政，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意向与选择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内传媒多少误读了欧洲左翼尤其是极左翼政党近年来复苏的选举政治意蕴。

③ Wikipedia,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nch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2.

单纯从 4 月 22 日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来看，奥朗德和萨科齐的得票率分别为 28.63%和 27.18%，其实是难分高下，而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左翼激进派候选人让—卢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中间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贝鲁(Francois Bayrou)分别获得了 17.9%、11.10%和 9.13%的选票。也就是说，虽然奥朗德的得票高于萨科齐 1.5 个百分点，但就大左右阵营得票的总比例来说，还是中右阵营更高一些，共计接近 55%——即法国选民总体上仍是呈现为一种“中右取向”。当然，问题似乎也正是出在这样一种“亲右构型”上。萨科齐也许正是“读懂”了这种民意支持构型的选举政治意蕴，即如果没有勒庞支持者的极右翼选民的投票，他就不太可能赢得选举，所以，萨科齐此后或明或暗地向勒庞及其极右翼政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勒旁显然认为萨科齐迈出的步伐太小，而中间派候选人贝鲁却认为萨科齐是在“政治玩火”。结果，在第二轮投票之前，前者宣布她并不认为萨科齐是国民阵线政策的合法代理人，而后者则明确呼吁其支持者将转向支持奥朗德，理由是不想看到法国选民的政治分裂，相应地，选举政治的天平就完全倾向于社会党一边。因而，笔者猜想，如果萨科齐明确承诺立足于一种总体“中间化”的政治政策（尤其是在财政政策与移民政策上），结果也许会更好一些(但鉴于上述结果所展现的选民基础差异，萨科齐肯定不情愿这样做）。因此，严格说来，萨科齐的结盟对象策略并没有“错”（取大舍小），而是“错”在无论是中间派还是极右翼政治家（其最可能的政治伙伴）都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依此而言，正是极右翼国民阵线和中间派的否定性政治选择最终决定了萨科齐的去留和输赢。

就其他方面来说，在总统选举竞选的第二阶段，萨科齐糟糕的政绩和夸张的主政风格当然不怎么受人欢迎，但奥朗德缺乏政治经验的事实和矜持个性也没有实质性改变，但当前者不再能通过巧言令色来掩饰自己并不出色的政绩、而后者的寡言少语却被描绘为一种政治与道德诚实的表现时（多少有些像 2005 年联邦德国大选中默克尔领导中右翼政党战胜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时的情形[①]），这些当代选举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及其“合力”就逐渐变得有利于奥朗德一方。依此而言，决定法国 2012 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并不是两大政党的竞选纲领或总体性的选民政治文化，而是第一轮投票结果所彰显的政党格局中左右政治支持的构型特征以及大右翼阵营内政党的政治选择。

总统选举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法国选民是否会将国民议会的主导权也交给社会党领导的中左翼阵营。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很可能将会再次看到一个“红绿黄（中间派）”大左翼联合政府，而那将是中左翼政治在欧洲大陆重新回到舞台核心的开始（再考虑到将于 2013 年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

三、总统选举中的默克尔或德国因素

[①] 郇庆治：《选举政治视角下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载刘玉安、蒋锐等著：《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24~440 页。

按常理说，德国或默克尔因素不应该成为影响法国选举政治的一个突出变量，但这在201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却成为了一个确定的事实。[①]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欧洲）经济危机应对思路，尤其是通过压缩财政支出、降低企业征税来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因而被媒体戏称为“默科齐”。而相比之下，作为社会党候选人的奥朗德却有着一些大胆而具有“破坏性的”想法——国内通过向富人征税来盘活法国财政，以及通过雇用更多的政府雇员来降低失业率，不仅如此，他还声称将领导一个“新欧洲”，因为“欧洲并不是由德国说了算”，其中一个标志性口号就是自己当选后的第一站就要去柏林“重新谈判”倾注了“默科齐”大量时间的欧盟财政契约。就此而言，默克尔或德国政府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偏好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情。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真正导致德国或默克尔因素浮出水面的却是长期作为欧洲一体化主动力的“法德轴心”在本次经济危机促动下的力量对比日益失衡，尤其是在德国方面——而且绝不仅仅是在经济实力意义上。

对此现象的一个生动阐释是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欧洲主任延•泰朝（Jan Techau）5月14日在清华大学所做的关于法国总统大选的时政演讲——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联邦德国人士。结果，笔者的本意是想进一步检验自己关于法国总统大选的理论假设及其缺陷，但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这位“欧盟”专家（该中心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身上透射出的竟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德国式“政治傲慢”——而且是法国大使馆人员在场的情景下。他的许多理论分析都是“正确的”或很有道理，但却是以一种多少有些颐指气使或洋洋得意的腔调，与笔者长期以来印象中的德国人的政治理性和含蓄（与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密切相联）大相径庭。

泰朝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是：法国社会党人的总统竞选获胜其实是得到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如果真的依照竞选中的政治承诺一意孤行，奥朗德不仅会毁掉法国的前途，也会毁掉社会党自身。理由很简单，财政支出紧缩和实行结构性改革才是法国和欧洲走出经济困境的唯一正确道路，而联邦德国目前的良好局面正是得益于社民党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几年前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为此付出了大选失利的代价。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国社会党人目前的政策主张与这种正确方向正好背道而驰。同样重要的是，今日的德国民众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德国并非主张见死不救，而是要求所付出的努力必须有所回报。这意味着，就像德国不会在援助希腊问题上无原则妥协一样，也不会向新上任的法国总统做重大妥协。因此，法国方面既不要抱太大的政治天真，也不会有真正的机会得到德国方面的退让——改变紧缩财政应对危机的总体思路，尽管会给予一些脸面上的考虑和照顾。

可以说，这位准官员学者所清晰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变化着的“德国欧洲观”：对于法国和希腊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时下德国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中的一种普遍心态：我们已经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充当所有欧洲人的“出纳室”，已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想法。缘于这种心态，德国目前的经济一枝独秀就更加被解读为自己的辛勤劳动

[①] 董铭、青木、纪双城：“德国总理默克尔被媒体批评干扰法国大选”，《环球时报》2012年4月28日，参见 http://news.sina.com.cn/w/2012-04-28/010024342056.shtml，2012年8月21日。

与艰苦努力。言外之意，所有的问题同伴都归根结底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和懈怠。由此才可以理解，德国大小官员一再表示的对希腊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漠视态度，以及默克尔总理对奥朗德竞选主张的公开反对态度。

从狭隘的经济立场来看，上述德国观点自有其道理，但若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却存在着很大问题：通过欧洲一体化来复兴欧洲是德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其历史责任所在（并非只是出于战争原罪救赎），这多少有点像历史上的神圣日尔曼帝国“义无反顾地”致力于维护罗马天主教的权威与神圣，因为其他同伴无一能够担当这一使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希腊绝非仅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经济累赘，法国也绝不是份量不断下降的不对等伙伴，而是必须要逐渐纳入一个统一的欧洲版图之中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德国如何担当好这种“领头羊”的角色。应该说，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德国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今日德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毕竟它是统一欧洲市场的最大受益者。

围绕着 2012 年法国大选和南欧经济危机，德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它已认定可以放弃自己的某些传统伙伴，或者料定这些伙伴除了被动追随外已经无路可走。但就像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它只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互动过程。并且，德国的经济政治实力也显然不足以改变目前的欧洲多极格局（更何况是整个世界）。甚至可以说，逐渐强大起来的德国如何扮演一个并不怎么骄横的欧洲强权角色，挑战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德国新一代政治家来说尤其重要。[①]回到 2012 年法国大选，从一种德国立场来说，默克尔及其同僚的“偏颇言辞”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了奥朗德而不是萨科齐，而且如果不是在总统选举后的适时立场调整的话，德国有可能继续“帮助”社会党（利用民众此时敏感的厌德情绪）取得国民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无论如何，它作为外部机会环境的一个侧面的确成为了影响法国大选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总统选举过程中。

四、一种综合性理论阐释

6 月 10 日和 17 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法国选民对奥朗德总统领导的社会党及其联盟政党的政治支持的印证，尽管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也极为罕见地取得了 2 个议席。其具体结果是：社会党及其外围政党 314 席、绿党 17 席、左翼阵线 10 席、区域主义左翼 2 席，而人民运动联盟及其结盟政党 229 席、中间派民主运动党 2 席、国民阵线 2 席、极右翼南方联盟 1 席。这样，社会党及其联盟自 1981 年以来首次获得了国民议会 577 个议席中的绝对多数，可谓是大获全胜。[②]再加上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两轮结果分别为 28.63%：27.18%和 51.64%：48.36%），2012 年法国大选最终成为了社会党喜出望外的一次“完胜”。作为一种回溯性理论分析，笔者所关心的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奥朗德领导的社会

① Carnegie Europe, ‘Germany: Making or breaking Europe?’ http://carnegieeurope.eu/events/?fa=3586&lang=en, 27 March 2012,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② Wikipedia,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s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nch_legislative_election,_2012,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12.

党何以能够从不利开局中崛起并完美赢得本次大选(或者说为什么萨科齐及其政党最终输掉了本次大选）？二是这一选举结果的政治意蕴又是什么呢？

表 1：法国 2012 年总统选举结果（4 月 22 日/5 月 6 日；投票率：79.48%/80.35%）

候选人	选票比例（第一轮）	选票比例（第二轮）
弗朗索瓦•奥朗德（社会党）	28.63	51.64
让—卢克•梅朗雄(左翼阵线)	11.10	
菲力普•普图(反资本主义党)	1.15	
娜塔莉•阿尔托(工人党)	0.56	
艾娃•若利(绿党)	2.31	
尼克拉斯•萨科齐(人民联盟)	27.18	48.36
弗朗索瓦•贝鲁（民主联盟）	9.13	
布尼古拉鲁诺•杜邦—艾尼昂（共和国崛起党）	1.79	
让-玛丽娜•勒旁（国民阵线）	17.90	
雅克•舍米纳德(团结与进步党)	0.25	

资料来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ections_in_France, 21 August 2012.

表 2：法国 2012 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6 月 10 日/6 月 17 日；投票率：64.4%/70.7%）

政党	选票（第一轮）	议席
社会党（PS）	29.35	280

激进左翼党（PRG）	1.65	12
其它左翼党（DVG）	3.40	22
区域主义左翼(REG)	0.56	2
绿党（EELV）	5.46	17
其它生态主义者	0.96	0
左翼阵线(FDG)	6.91	10
其它极左翼	0.98	0
人民运动联盟（UMP）	27.12	194
新中间党（NC）	2.2	12
激进党（PRV）	1.24	6
中间联盟(AC)	0.6	2
其他右翼(DVD)	3.51	15
法国民主联盟(MoDem)	1.76	2
国民阵线(FN)	13.6	2
其它极右翼	0.19	1

资料来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ections_in_France, 21 August 2012.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选举政治的一般理论来说，我们可以把影响一次大选结果的变量要素概括为如下三个：执政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其中选举战略还可细化为竞选纲领、议题创制、候选人政治形象和竞选策略，政治机会环境还可细化为执政周期、政党格局及结盟构型、国际环境等方面。总体而言，上述三维变量组成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仍可以（有助于）解释法国 2012 年大选的结果：相对糟糕的执政政绩尤其是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

济表现，再加上并不成功的选举战略和不怎么有利的政治机会环境，共同决定了萨科奇及其领导的中右政党的败选或奥朗德及其领导的社会党的成功。[①]对这次大选而言稍显特殊的是，伴随着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崛起而日趋明显的左右平衡政治的“右翼化”并不能保证温和右翼政党的竞选连任，而经济危机/困境的总体背景使得主流政党的竞选纲领及其政策主张更难以动员起获胜所必需的充足选民数量，结果是极端性小政党生存空间和政治平衡能力的空前增加——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的两轮投票选举体制下，而主流政党因势利导地调整竞选战略和利用变化着的政治机会环境变得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如下五个次级指标因素：政党竞选纲领、竞选策略、候选人政治形象、执政周期（政治时钟）和默克尔或德国因素。就第一个因素来说，奥朗德的反紧缩竞选政治口号的确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下层选民，但一方面，适当的财政紧缩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克服经济危机/困境的必由之路，这恐怕是法国中产阶层主体都心知肚明的政治道理，另一方面，大约 30%的工人阶层并未参加投票，而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大量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国民阵线（30%左右）和左翼阵线（共产党），而不是社会党。至于第二个因素，虽然很难说奥朗德有着更为出色的竞选策略，比如在竞选过程中的苛意平民化形象取向和在电视辩论中的温儒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萨科齐的媚从极右翼政治议题与选民的策略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极右翼政党领袖勒旁并不买帐，而中间党候选人贝鲁则公开批评，使其争夺极右翼选民和保持传统中间选民票仓的意图落空。在第三个因素方面，尽管两个主要候选人的得票结果上的确有些群体性差异，比如奥朗德获得了更多年轻人和公务员阶层的支持，而在性别方面，他虽然的确获得了更多男性选票，但女性的支持率并没有变化，而一般来说，女性选民更多受到候选人个性魅力的影响。也就是说，政治个性形象作为奥朗德区别于萨科齐的一种竞选策略也许是非常成功的，但却很难说是影响选民决定的重要因素。对于第四个因素，法国已经在中右翼总统的统治下达 17 年之久、尤其是本届政府最初还同时拥有议会两院的多数地位，但法国在欧盟和世界中的大国地位与法国选民的生活感受却是每况愈下，这种状况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客观必然性，但对于任何执政党来说却是十分不利的。正因为如此，一种倾向变革的氛围实际上早已开始酝酿，而经济危机进一步使之强化和发酵，换句话说，法国政治时钟的“左摆”之势已然形成：这方面有着三组支持性的数据：一是 64%的投票人感觉生活水平在下降，而 2007 年大选时只有 55%；二是媒体一直预言奥朗德会在总统选举中的第二轮中获胜，但在各方面综合评价上却是萨科齐得分更高些；三是依据得票实际结果分析，奥朗德更多受益于选民的“不希望对方获胜”（44%：32%）和“政治倾向”（43%：29%）而不是“竞选政策”（55%：57%）和“个人魅力”（22%：28%）[②]。此外，尽管奥朗德的反紧缩、反德国（主宰欧盟）立场的确为其增加了不少媒体关注度，我们却很难说默克尔或其他德国高官的言论实质性影响了法国大选的总体结果（尤其是国民议会选举）。因此，也许可以大胆一些说，如果要从上述五个因素中确定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竞选策略和执政周期，而不是政党竞选纲领、候选人个性政治形象和默克尔或德

① 郇庆治：《当代欧洲政党政治：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第 83~157 页。
② 这些数据都来自理查德·巴尔默（Richard Balme）教授 2012 年 5 月 24 日在清华卡内基中心的学术演讲：“法国大选及其对华关系影响”。

国偏好因素。[①]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竞选连任的最重要条件是能够根据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并不怎么有利的环境）适时制定/调整契合选民意向的竞选策略，否则的话，那些相对客观性的变量比如执政表现和执政周期压力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②]

再谈第二点。笔者认为，法国 2012 年大选的政治意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总统选举与国民议会选举的良性互动效应。从纯理论上说，2007 年两大选举的积极结果（中右翼政党同时掌控总统府和总理府）并不能保证今年选举中的必然重复，尤其是考虑到目前欧洲的动荡局势和法国选举政治文化的易变特点，但事实证明，奥朗德的胜利大大增添了社会党的获胜机会——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法国选民对政党政府的政治信任，希望通过政治授权带来他们所希望的经济社会政策改变，从而暂时终结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曾几度困扰法国政坛的“左右共治”（总统府和总理府分别为不同的左右主要政党所控制）难题。二是对于法国政党体制的影响。一方面，本次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结果进一步表明，法国长期以来的“左（共产党 11.1%/6.91%）—中左（社会党 28.63%/29.35%）—中间（民主运动 9.13%/1.76%）—中右（人民运动联盟 27.18%/27.12%）”的“两大两小”相对平衡格局已不复存在，左翼阵线和法国民主运动在总统选举中相对突出的表现很难解读为这一构型的恢复，而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已稳定取代了传统中间派的政治位置，尽管这更多意味着一种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的确是法国大左翼的又一次政治振兴机会，尽管绿党的选举表现非常一般（得票分别为 2.31%和 5.46%），而社会党的“一党独大”也许会产生一些相反意义上的影响（鉴于绿党和左翼阵线在议会多数中的非必需地位）。但是，社会党在失去总统职位 17 年和失去议会领导权 10 年后又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的核心（同时掌控总统府、总理府和议会两院），这对于一个选举性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是对于法德关系和欧盟/欧元的影响。奥朗德当选对于传统的法德轴心关系及其革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机会，这将是 1981 年大选后法德关系发展轨迹的重复呢还是一种颇为不同的新走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但避免出现“德国的欧洲”显然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国自己，今天恐怕更是如此，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欧盟和欧元的未来密切相关。四是对中法关系的影响。尽管社会党和绿党对外政策上的特点对于中法关系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至多是在“磨合期”长短的意义上，从总体上说，法国的世界地位和内部危机重重注定了中法关系不会有太大的波澜，除非我们对此过于敏感或寄予太大的期望。因此，在笔者看来，法国 2012 年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的影响更多是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上，尽管我们绝不能说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大选。

[①] 新华网：“奥朗德经济政策俘获民心 获胜几成定局”，参见 http://news.qq.com/a/20120504/000266.htm；“媒体称萨科齐若败选主因被太多选民厌恶”，参见 http://news.qq.com/a/20120505/000321.htm；“分析称萨科齐强势执政是其败选重要原因”，参见 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320.htm；“萨科奇的孤高性格会遭中产阶级嫌弃？”参见 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565.htm，2012 年 8 月 21 日。

[②] 赵怀普：“萨科奇执政 5 年对内经济发展乏善可陈”，参见 http://news.qq.com/a/20120507/000551.htm，2012 年 8 月 21 日。

中国与大国关系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对 1960-2009 年数据的统计分析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讲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载于《欧洲研究》2012 年第 5 期

【内容摘要】为了研究中国与各大国外交关系的变化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分别对国际格局、权力转移、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根据 1960 年至 2009 年的数据，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并通过了检验。统计显示，1960-198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双边贸易、核武器、意识形态这四个因素的影响。1990-2000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受双边贸易与核武器情况的影响。2001-200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和双边贸易的影响，而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未来几年，中国外交将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关键词】国际格局、权力转移、核武器、相互依赖、中外关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国际关系学者的使命之一是根据既往历史总结规律，进而从中窥探未来的趋势变化。在中国外交领域，中国与各大国的外交关系意义重大。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方向和主要内容。然而对于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问题，我们发现不同的学者观点各异，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何判断正误？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通过一套标准的方法找出中国与大国关系的规律，进而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借助实证方法。之所以会出现学者观点各异的情况，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分析或经验分析，因此其结论的有效性与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有关。为此，笔者将根据历史数据，采用统计回归方法，试图对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做一探究。

一、文献回顾

对于中国与各大国外交关系的研究，诚可谓汗牛充栋。对于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有的学者从新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强调国际格局这一结构因素关键原因，有的学者从新自由主义出发强调相互依赖的影响。综合而言，笔者认为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因素：国际格局、权力转移、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下文将围绕这些因素对既有观点做一回顾。

（一）国际格局

对于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稳定程度的关系，有很多学者从历史冲突与战争的统计来研究极与战争或稳定之间的关系。[①]概言之，学界主要有霸权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和多极稳定论

本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的阶

等观点。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霸权国的是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①]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单极体系是持久和平的。[②]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和戴维·列维等人论证了多极体系最稳定的假设。[③]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两极体系是稳定的系统。[④]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两极体系之所以最稳定，是因为两极权力构造所产生的大国间恐惧最小。[⑤]

不同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关系会有变化，肯尼迪·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都必须为生存和安全而斗争。由于永远无法确信最强大的国家不会利用其权力优势来侵犯本国安全，因此各国自然会将权力最大的国家视为威胁并试图加以制衡。⑥均势理论所指的“制衡”，强调的是制衡国在物质实力上对潜在霸权国的追赶和平衡。[⑦]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围绕其他国家是否会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出现很多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冷战以后美国的多次军事行动如“反恐战争”并没有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是因为“反恐战争”或者没有直接威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或者“反恐战争”追求的利益与其他国的利益是相一致。[⑧]另一种观点认为，冷战后不是没有制衡，只不过形式变成了软制衡，而非传统的以扩充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为主要方式的制衡是硬制衡。[⑨]软制衡（soft balancing）是指即一般大国可以通过如领土拒绝、外交纠缠、增强经济实力等非军事手段[⑩]，或者有限的军事集结和非正式的结盟等方式，[11]实现延迟、阻挠和削弱霸权国军事政策的目的。[①]

段性成果。

[①] 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The wages of war, 1816-1965: a statistical handboo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2); J. David Singer and Paul F. Diehl. ed., *Measur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J. 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Bruce M. Russett ed., *Peace, War, and Number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2), pp. 19-48; 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Alliance Aggregation and the Onset of War”, in J. David Singer, ed., *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p. 246-286.

[①]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2, (Jun., 1981), p. 247.

[②]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 9.

[③] Karl W.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Vol. 16, No. 3 (Apr., 1964), pp. 390-406.

[④]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161-176.

[⑤]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45.

[⑥]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2000, p. 27.

[⑦] Layne, Christopher, 2004,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 106.

[⑧]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pp. 109-139.

[⑨] T. V. Paul, “Introduction: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p. 1-25; Robert A. Pape, “Soft Powe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2005, pp. 46-71. 中国学者对软制衡说的梳理和评介见：杨少华：《评“软制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7 期，第 40-60 页；焦世新：《软均势论及其实质》，《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8 期，第 57-63 页。

[⑩] Robert A. Pape, “Soft Powe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p. 36-37.

[11]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p. 58.

在 1950 年以来，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到冷战后的美国独霸，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与大国关系围绕制衡形成了不同的联盟。贺凯根据格局和威胁感两个因素解释在 1949-2005 年中国对美国采取的均衡战略。他认为，在单极格局情况下，中国甚至被霸权国受到军事威胁的时候，中国作为非霸权国会选择内部平衡措施，以保持外部平衡。在两极格局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不是极性国家（超级大国两者之一），会选择外部平衡措施，以减少两方超级大国的威胁。在多极格局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极性国家，会采取内外部平衡措施，以处理好安全威胁。[②]陈志敏指出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中欧关系难以实现大的突破。[③]可见，国际格局是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大国通常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当不满于既有秩序的崛起国认为有机会赢得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将选择以战争手段加速权力转移。[④]塔门认为，在权力转移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大，但最严重的霸权战争将发生在权力转移实现之后。[⑤]同盟的形成与大国相对权力转移的临界点具有较高的相关性。[⑥] 因此随着权力转移的变化，大国同盟与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有学者从权力转移角度解释中美苏关系，认为最近美国不断加强同盟关系的行为源于中国实力的增长所引起的权力转移。[⑦]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下降。使美国应用经济力量影响东北亚地区的效用被大幅削弱。中国经济复兴还降低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地位。[⑧]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指出，“东亚正在出现可以说是两种相异的等级体系。一个是由美国主导的安全层级体系，另一个则是由中国主导的经济等级体系。……当中国变得更强大，并且已经明白表达了其更加积极的地区定位时，该地区的很多国家正在加强与美国的安全联系。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在拓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⑨]权力转移理论悲观地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除非美国在现有体系之内有效容纳中国的崛起并成功对中国进行从制度到观念的整合，使其成为一个

---

① Robert A. Pape, “Soft Powe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 10.

② KAI HE, Dynamic Balancing: China’s balancing strateg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1949–200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9), 18(58), January, 113–136.

③ 陈志敏：《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④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Ch.1;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123;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 7.

⑤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28-29.

⑥ Daniel Y. Chiu,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in the Power Cycle Theory of Stat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4, No. 1, (Jan., 2003), pp. 123-136.

⑦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8); Sheena Chestnut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Rising?’ in Eva Paus, Penelope Prime, and Jon Western, eds., Is China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237-254.

⑧ Jason T. Shaplen and James Laney, “Washington’s Eastern Sunset: The Decline of U.S. Power in Northeast Asia”,*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Nov. - Dec., 2007)

⑨ 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地区安全变革的四大核心命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8 页。

“满意的”大国。[①]也有学者认为，冷战后中国与俄罗斯之所以不建立制衡美国的军事同盟，就是因为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太大，面临制衡门槛。[②]

中日关系也受到权力转移的影响，21 世纪初，中国学界出现了“对日新思维”论战。[③]但是小泉时期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双方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次出现摩擦。有学者从权力转移角度解释中日的结构性矛盾。[④]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的研究则显示，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争取东亚主导权；其次牵制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最后则是为了领导区域合作[⑤]。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已经获得了在东南亚地区的绝对领导地位。日本通过与美国联盟建立的“硬”制衡战略已显现出不足，因此现在日本转向去通过软制衡来遏制中国。[⑥]可见，由于中国崛起影响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因此中日矛盾难以避免。

（三）核武器

核武器诞生以后，出现了核和平现象，学者认为存在一种不使用核武器的禁止性规范。这种规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受到公众的价值认同、对战争合法性的认识以及道德观的影响。这种规范在社会实践中被不断加强，最后形成禁忌，并通过军控等条约被制度化。[⑦]在核禁忌下，产生了冷战以来的“核秩序”（nuclear order），核秩序是规范性的，其基础是大国创造的“威慑管理系统”（managed system of deterrence）和“禁欲管理系统”(managed

---

[①]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9, No.4, 2003, pp.269-271;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9, No.4, 2003, pp.315-342; Jacek Kugler, “The Asian Ascent: 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7, No.1, 2006, pp.36-42;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 No.1, 2006, pp.35-55;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0, No.4, 2007, pp.639-682;

[②] William C. 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t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8-118; Paul Schroeder, “Why Realism Does Not Work Well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3), pp. 114-127;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91-97; 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9 期，第 36—42 页。

[③] 参见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6 期，第 41-47 页；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2 期，第 71-75 页；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4 期，第 1-17 页；冯昭奎：《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5 期，第 78-84 页；冯昭奎：《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6 期，第 26-33 页；冯昭奎：《四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4 年第 1 期，第 49-54 页；林治波：《对当前中日关系若干问题的看法》，《战略与管理》2004 年第 2 期，第 89-93 页；凌星光：《战略对头战术欠妥——评马立诚和时殷弘的两篇文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9 期，第 17-21 页；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2 期，第 25-30 页。

[④] 周方银：《从预测误差看中日关系走向》，《世界知识》2004 年第 22 期，第 46-47 页。阎学通：《实力地位决定大国关系 中日之间属于结构性矛盾》，《环球时报》，2005 年 10 月 22 日。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09-211 页。

[⑥] Sohn Yul，“Japan's New Regionalism : China Shock, Universal Values and East Asian Communitys”， WIAS Discussion Paper，No.2009-005.

[⑦] Nina Tannenwald, The Nuclear Tabo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ystem of abstinence)，“威慑管理系统”主要针对核国家。通过增强对核武库的管理控制系统，和在核国家之间特别是美苏之间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共识，以避免核战争的爆发。“禁欲管理系统”则是针对非核武器国家。“禁欲”指非核国家主动放弃发展核武器。核国家通过诸如提供安全保障、帮助和平发展核能、以及承诺最终削减核武器等手段来维持这一系统。[①] 可见，有核国家之间以及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Charles Glaser 认为核武器的存在、中美之间的地理差距和两国之间的合作趋势这三个因素会有利于两国之间的采取防御态度，并减少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②]

但是，冷战后核秩序受到破坏，核和平受到挑战。冷战期间，在大国核保证下，中小国家没有发展或获得核力量的意图。两极格局的结束使大国核保证受到削弱，这增强了国家获得核武器的意图。当前世界面临核扩散威胁。[③]随着美国单边主义的倾向愈来愈强，美国对于军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国会驳回《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并公布新一轮的导弹防御计划，国际社会开始对核秩序失去信心。与此同时，印巴核试验也使得“禁欲”系统变得岌岌可危。[④]2007 年美国于开始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后，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就面临着被削弱甚至被抵消的危险。[⑤]中国在加强自身的导弹技术。2007 年 1 月 11 日，中国进行了一次反卫星导弹试验，发射导弹成功击毁了本国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⑥]此外，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2007 年中国东风 31 型导弹的射程下限为 7200 千米，而在 2008 年至 2010 年间，东风 31A 型的射程下限已经增加至 11200 千米，达到洲际射程的范围。[⑦]从拥有核武器之初开始，中国一直以来的核战略都是“最小威慑”。若美国建立起防御系统，那么中国的威慑就会被大大削弱。因此中国只能继续发展核力量。这就会造成一种中美之间的核“军备竞赛”。[⑧]

（四）经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是指是“国家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间以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⑨]他们进而指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具有非对称性，并将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源。不同类型的相互依赖都产生潜在的政治影响，敏感性相互依赖才有可能提供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

① William Walker, “Nuclear Order and Dis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4 (Oct., 2000), pp.704-724.

② Charles Glaser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③ Francis J. Gavin, “Same As It Ever Was: Nuclear Alarmism, Prolifer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Winter 2990/10), pp. 7-37.

④ William Walker, “Nuclear Order and Dis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4 (Oct., 2000), pp.704-724.

⑤ 有学者曾质疑中俄两国是否具有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见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End of MA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p. 7–44. 但另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予以了反驳，见 Bruce G. Blair and Chen Yali, “The Fallacy of Nuclear Primacy,” China Security, Autumn, 2006, pp. 51-77; Lin Bin, “Paper Tiger with Whitened Teeth,” *China Security*, Autumn, 2006, pp. 78-89。

⑥ Joseph Kahn, “China Confirms Space Test; Denies Intent To Intimidat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07, p. 8.

⑦ 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核力量数据库，http://first.sipri.org/search。

⑧ Brad Roberts, Robert A. Manning, Ronald N. Montaperto, “China: 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4 (Jul. - Aug., 2000)，pp. 53-63.

⑨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3 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1]保罗·帕帕友努（Paul A. Papayoanou）考察了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制衡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现状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很紧密，同时与存在威胁的修正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很低，那么现状国家就会制衡修正主义国家；如果现状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很低，而与存在威胁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很高，那么现状国家将很难制衡。[2]卡普兰（Dale Copeland）指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关键是对未来双方可能展开贸易的预期。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才会导致和平。[3]

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斯指出，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其他国家与美国的相互依赖是非对称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对它们的依赖，这使得美国不会过分担心其他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来制约它的安全政策。[4]邝艳湘对中美贸易关系做了案例分析，她指出，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低级别冲突会增加，但不会升级为高级别冲突，因为相互依赖使双方的退出成本高于门槛成本。[5]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增加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增多了冲突。[6]伊肯伯里认为，中国已经在当前世界开放的市场体系中获得巨额的经济回报，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推翻这个体系。[7]因此，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增进合作，降低中国选择武力扩张方式崛起的可能性。[8]

（五）意识形态

拥有相似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容易合作并结成同盟。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认为意识形态是同盟对其自身进行“合理化”的基础；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勾画对未来的蓝图而为同盟凝聚力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9] Thomas Risse 认为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结成安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三方面是一致的：集体认同与共同的价值观念，各国在政治、

---

[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c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04, pp.15-16.

[2] Paul A. Papayoanou,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1, 1997, pp.113-140. 此外，学者陈琪也有类似论述，见陈琪：《经济相互依存与制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9 期，第 11—16 页。

[3]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4]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Libe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Constraints Derived from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Brooks and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pp. 98-147.

[5] 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

[6]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2007, pp. 639-682.

[7] John G.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1，2008，pp.23-37.

[8] 贺凯认为，由于与亚太地区国家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倾向于通过制度制衡而非传统军事同盟制衡的战略来应对威胁，这将提高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与国际制度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的文献另可参见 Thomas G. Moore and Dixia Yang, “Empowered and Restrain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91-229;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约翰·伊肯伯里：“中国的崛起：权力、制度与西方秩序”，《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9] George F.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61.

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赖，调节社会秩序的国际治理结构[①]。为什么美国在欧洲建立的安全组织采用多边主义制度形式而在亚洲采用的却是双边主义制度形式？这归因于美国决策者对他们的欧洲和亚洲盟友感受到的不同认同水平。由于种族、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使美国决策者将欧洲盟友视为平等的共同体成员，而亚洲盟友则被看作一个低层次的共同体。[②] 因此英法等欧洲国家与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一致而关系更为密切。可见。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权力和安全的来源。通过在国际体系中复制、推广其国内的意识形态，进而直接干涉和控制他国国内事务，一国可以获得追随者的“意识形态效忠”，最终在国际系统中提高其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相似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愿意结盟？欧文（John M. Owen,）北约和华约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两个根据意识形态划界的同盟中，每一方都担心丧失合法性和权力，因此总是反对对方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容纳它，其结果是意识形态集团将愈加牢固，螺旋式发展成相互敌对的同盟。这些同盟的主要目的不是促进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共同防御外部进攻。[④] 因此，从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何中美关系不如美欧关系，为何中国与美、欧各国难以形成同盟。

在中美关系上， 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 强调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差距，中美建交 30 年来的接触并没有拉近两国之间的世界观。她认为除非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否则中美关系难以真正改善。[⑤]中苏关系也可以用意识形态加分析。意识形态是中苏结成同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唐纳德•扎高利亚（Donald Zagoria）认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间的联系是中苏关系的凝聚力。[⑥]哈德逊（G.F. Hudson）、理查德•罗文索（Richard Lowenthal）和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以及约翰•基廷（John Gittings）等学者都认为，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⑦]

综上可知，影响中国与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印度这些大国外交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那么在诸多因素中，究竟哪些因素真正产生影响，哪些因素没有作用，对此学界存在争议，尚无定论，因此下文将结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图就此问题作一定量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操作

[①] 参见[美]托马斯·里斯：《自由安全共同体中的美国权力》，载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 259-277 页。

[②]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Summer, 2002), pp. 575-607。

[③] Nigel Gould-Davies,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 No. 1 , 1999, pp. 90-109.

[④] John M. Owen, IV, 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17–155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5) 49, 73–99

[⑤] 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9) .

[⑥] 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⑦] G.F. Hudson, 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 Praeger, 1961).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8).

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变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就此判断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势，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提出研究假设、建立研究变量并设定统计模型。

（一）研究假设

根据前文的文献回顾，笔者对中国与大国关系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国际格局对中国与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两极格局下，中国必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选择一个，而其他大国也是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因此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容易大起大落，如中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导致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下，中国与大国关系波动幅度不大。

假设二：中国与大国的实力对比变化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在实力差距大时，双边关系较好，在实力差距较小从而出现权力转移时，双边关系容易恶化。

假说三：中国与大国关系与两国是否为核国家有关。本文认为，若两个国家都是核国家，则双方会克制冲突的程度，尽量避免战争，若双方都不是核国家或者一方不是核国家，则没有核禁忌，冲突可能正常爆发。

假设四：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与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有关。若两国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则双方关系较好，若两国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则双方关系较差。

假设五：中国与某一大国的关系受到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与中国接近，则关系较好，反之则较差。

（二）变量操作化

根据以上假设，下面笔者将对本文研究的变量关系进行分析。主要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由于本文数据所限，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1960 年至 2009 年。

对于国际格局这一变量，1950 年以来的国际格局只有冷战前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的一超多强，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中国与大国外交呈现新的特点。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将数据分成三个阶段：1960-1989 年、1990-2000 年和 2001-2009 年，分别观察这三个时间段的特点。

对于实力差距和权力转移这一变量，由于中国崛起导致的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的权力转移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变化，因此笔者用中国 GDP 与该国的 GDP 的差距作为指标来表征实力差距。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数值。[①]本文选择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以当期美元（current

[①] 1960-2009 年 GDP 数据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该数据库中只有 1960 年以后的 GDP

US$）为单位。在统计中，一般用 lnGDP 表示经济发展，因此本文中历年美国 GDP 减去中国 GDP 的差值的数学表达式是：ln 某国 GDP-ln 中国 GDP。

对于核国家这一变量，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两国都是核国家、仅有一方是核国家以及双方都不是核国家，因此这一变量也是虚拟变量。赋值情况为：若两国都没有核武器，赋值为 0，若一国有核武器，赋值为 1，若两国都有核武器，赋值为 2。其中，各国拥有核武器的时间按照它们第一次发射原子弹时间为准：美国为 1945 年 8 月，苏联为 1949 年 8 月，英国为 1952 年 10 月，法国为 1960 年 2 月，中国为 1964 年 10 月，印度为 1998 年 5 月。

对于相互依赖这一变量，从理论内涵上看，相互依赖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合作，因此本文将以中国与大国的双边贸易额度量相互依赖的程度。[①]采用的指标是 ln 中国与某国贸易额。

对于意识形态变量，笔者采用国外有关政体的数据库，[②]这一数据库主要按照国家的民主程度打分，民主程度高的国家为 10 分，民主程度低的国家则为 0 分。

对于中国与大国关系，本文将采用《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一书中的数据。[③]由于该书数据的时间范围是 1950-2005 年，因此 2006 年至今的数据采用的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预测组的尚未发表的数据。由于其他变量如 GDP 和双边贸易额的时间单位是年，而中国与大国关系分值的时间单位是月，为了协调一致以方便统计，笔者将中美关系中每年 1 月份的双边关系分值作为当年分值。

三、面板数据分析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笔者应用 Eviews6.0 软件进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笔者对中国与美、日、苏（俄）、英、法、德、印的关系做一个总体分析，判断在权力转移、双边贸易、核武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中，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为了看清国际格局的影响，下文的数据分析分为 1960-1989 年、1990-2000 年和 2001-2009 年这三个时间段进行考察。

数据，没有 1960 年以前的 GDP。因此统计分析的时间段为 1960 年至 2009 年。

[①] 本文采用的 1950-2006 年中外贸易数据来源是：Barbieri, Katherine, Omar Keshk, and Brian Pollins. 2008.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COW_Trade_2.01. 网址为: http://correlatesofwar.org. 更新时间为 2010 年 3 月 5 日。由于该数据库的数据只到 2006 年，因此 2007-2009 年中外贸易额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 中国统计年鉴》、《2008 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登录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6 日。

[②] 网址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inscr.htm。

[③] 阎学通等著：《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表 1　1960-1989 年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两国 gap 差距	2.445***	2.087***
	（0.376）	（0.355）
双边贸易	0.873***	0.896***
	（0.062）	（0.060）
核武器	-1.167***	-1.049***
	（0.372）	（0.363）
意识形态	0.415***	0.350***
	（0.149）	（0.134）
常数项	-10.862***	-10.092***
	（1.420）	（1.430）
R2	0.831	0.756
F 检验 p 值	0.000	0.000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		10.591
豪斯曼检验 p 值		0.032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2)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0%、5%和 1%。

在上表中，R2 是样本决定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1）区间，“R 2 测度了在 Y 的总变异中由回归模型解释的那个部分所占的比例或百分比。”[①]R2 越接近于 1，说明模型的拟

[①] 古扎拉蒂著,林少宫译：《计量经济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6 页。

合效果越好。F 检验是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就是判断自变量从整体上对因变量是否有显著影响。[①]若 F 检验 p 值接近于 0，则说明模型通过检验。在表 1 中，笔者针对 1960 年至 1989 年的数据，以中国与各大国关系为个体分别分析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从 R2 看，固定效应模型的 R2 为 0.831，随机效应模型的 R2 为 0.756，可见拟合效果均较好。

为了判断本文模型究竟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可以通过豪斯曼检验来判断。豪斯曼检验的 p 值是拒绝原假设的概率，如果豪斯曼检验的 p 值非常小，就可以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豪斯曼检验的 p 值比较大，就不能拒绝原假设，必须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在 Eviews6.0 中，只有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才可以进行豪斯曼检验。因此，表 1 中豪斯曼检验 p 值的具体结果放在随机效应模型下。根据表 1，豪斯曼检验统计量为 10.591，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为 0.032，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表 1 的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两国 GDP 差距、双边贸易、核武器、意识形态这四个解释变量的的 p 值均小于 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1960-198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双边贸易、核武器、意识形态这四个因素的影响。由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 2.445，这说明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较好，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则中外关系较差。双边贸易的系数为 0.873，这说明当两国贸易量较大时，则中外关系较好。核武器的系数为-1.167，这说明当若双方都不是核国家或者一方不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差。当两个国家都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好。意识形态的系数是 0.415，这说明对方民主程度越高，中外关系越好，这与前文的假设不相吻合。

表 2　1990-2000 年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两国 gap 差距	-1.764***	-1.379***
	（0.300）	（0.171）
双边贸易	0.296	0.863***
	（0.199）	（0.122）

① 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3 页。

核武器	0.073	-0.547
	（0.655）	（0.404）
意识形态	0.834***	0.047
	（0.292）	（0.126）
常数项	-6.518**	-4.126***
	（2.900）	（1.359）
R2	0.861	0.535
F 检验 p 值	0.000	0.000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		37.662
豪斯曼检验 p 值		0.000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2)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0%、5%和 1%。

在表 2 中，笔者针对 1990 年至 2000 年这一阶段的数据，以中国与各大国关系为个体分别分析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了判断究竟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笔者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根据表 2，豪斯曼检验统计量为 37.662，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为 0.000,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 R2 看，固定效应模型的 R2 为 0.861，可见拟合效果较好。

根据表 2 的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两国 GDP 差距和意识形态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的 p 值均小于 1%，但是双边贸易与核武器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1990-2000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受双边贸易与核武器情况的影响。由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1.764，这与 1989 年前的情况相反，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不太好，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则中外关系反而较好。意识形态的系数为 0.834，这说明对方民主程度越高，中外关系越好。

表 3　2001-2009 年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两国 gap 差距	0.710*	0.038
	（0.389）	（0.341）
双边贸易	1.1490***	0.374
	（0.326）	（0.259）
意识形态	1.173	-0.850**
	（0.777）	（0.383）
常数项	-19.092**	7.824 *
	（9.298）	（4.596）
R2	0.878	0.094
F 检验 p 值	0.000	0.119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		15.966
豪斯曼检验 p 值		0.001

注：(1) 括号内为标准差；(2)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0%、5%和 1%。

没有将核武器作为自变量。

在表 3 中，笔者针对 2001 年至 2009 年的数据，以中国与各大国关系为个体分别分析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了判断究竟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笔者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根据表 3，豪斯曼检验统计量为 15.966，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为 0.001,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 R2 看，固定效应模型的 R2 为 0.878，可见拟合效果较好。

表 3 的模型中没有将核武器情况放入自变量。因为核武器变量是个虚拟变量，在 2001 年至 2009 年期间组内是非时变的，无法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这一情况在 1960-1989 年和 1990-2000 年两个时间段内不存在，所以表 1 和表 2 中核武器情况均是自变量。根据表 3 的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两国 GDP 差距和双边贸易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的 p 值均小于 10%，但是意识形态的系数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2001-200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和双边贸易的影响，而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由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 0.710，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较好，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则中外关系反而不太好。双边贸易的系数为 1.1490，这说明双方经贸往来越多，中外关系越好。

四、结语

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笔者作出以下判断：

首先，国际格局对中国与大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从回归结果看，在冷战时期，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因素比较综合，既有两国实力差距和核武器情况这些高政治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和双边贸易这些低政治因素。而在冷战结束后，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因素比较具体，例如在 1990 年至 2000 年期间，主要影响因素是实力差距和意识形态，而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主要影响因素变为实力差距和双边贸易。可见，在两极格局下，由于中国外交可以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回旋，具有较多的外交空间。但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独霸的情况下，中国外交主要受到美国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而美国经济发展减缓，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加重，中美关系动荡不定。而在美国独霸地位影响下，美国的盟友对华政策也深受中美关系影响。

其次，权力转移理论可以解释冷战时期和 2001 年至 2009 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但是不能解释冷战刚刚结束时期即 1990 年至 2000 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根据前文的回归分析，两国 GDP 差距在三个时间段都显著。对于 1960-198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 2.445，这说明当其他大国实力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较好。对于 1990-2000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1.764，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不太好。对于 2001-200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 0.710，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则中外关系不太好。可见，在冷战刚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引起霸主国的担忧，而在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的发展遭到美国的遏制，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就是出于维护霸权的考虑。

第三，双边贸易对 1960-1989 年以及 2001-2009 年的中外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在冷战刚结束时期的 1990-2000 年期间不产生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在 1960-1989 年期间，双边贸易的系数为 0.873，这说明当两国贸易量较大时，则中外关系较好。在 2001-2009 年期间，双边贸易的系数为 1.1490，这说明双方经贸往来越多，中外关系越好。笔者认为，在冷战时期，贸易关系体现了双边关系的好坏，在中国尚未与一些大国建交时，经贸往来明显很少。

在冷战刚结束时，尽管中国与大国的经贸往来明显增加，但并没有达到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经贸关系没有对中国与大国外交产生显著影响，而在 2001 年以后，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高速增长，中国与一些大国已经出现了经济相互依赖的现象，经贸关系会影响双边外交关系！

第四，意识形态对 1960-1989 年以及 1990-2000 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对 2001-2009 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在 1960-1989 年期间，意识形态的系数是 0.415，这说明对方民主程度越高，中外关系越好。在 1990-2000 年期间，意识形态的系数为 0.834，也表明对方民主程度与中外关系成正比。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在冷战时期，按照意识形态划线，按理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对华关系会较差，为何回归结果会相反？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冷战时期，尽管中国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与中国建交，日本、英国等美国盟友也同期与中国建交，因此尽管意识形态对冷战时期的外交有深远影响，但未涉及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关系。冷战刚结束时期，尽管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冷遇，但是中国外交很快打破僵局。直到 2001 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形成挑战，中国与大国的外交主要受到权力转移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因素则基本不发挥影响。此外，回归结果也受本文选择对象的影响，因为本文研究的是中国与美、日、俄、英、法、德、印这些大国的关系，而这些大国民主程度都较高，所以结果是意识形态与中国对大国外交成正比。若本文将中国与大国外交和中国与中小国家外交做一对比，这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而囿于数据所限，这在目前尚未能完成！

第五，核武器情况对 1960-198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对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根据面板回归数据，在 1960-1989 年期间，核武器情况的系数为-1.167，这说明当若双方都不是核国家或者一方不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差。当两个国家都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好，这与前文的假设一致。至于在冷战结束后，核武器情况对中国与大国外交关系没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是与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核武器的作用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长期以来的目标是争霸，若中国拥有核武器，可能威胁美、苏的地位和安全，因此会使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恶化。但是冷战结束后，在本文所研究的这些大国中，除了日本与德国，其他大国都拥有了核武器。而核武器的作用主要在于避免两国发生大战，即核威慑战略，这使大国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外交前提，但核武器情况无法解释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大国外交中的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

综上可知，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主要受权力转移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影响。由于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到威胁安全，所以美国不断加强在全球的军事存在。[①]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中国未来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将会继续加深。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结束后的影响力下降，美国与欧洲等民主国家间的关系可能趋于冷淡，而中国可以加强与英、法、德等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同时巩固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以有效抗衡来自美国的压力。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2010, pp. 381-396.

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未来

田斌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载于《中国经济外交》2012 年刊，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版

一、中欧经贸发展的现状

经过 36 年的发展，中欧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双方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而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更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2003 年中欧贸易额首次超过 1000 亿美元，2005 年则实现 2000 亿美元，2008 年更突破 4000 亿美元大关。欧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的位置，中国连续 8 年位居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即便在遭受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两大危机的冲击，中欧经贸关系却仍表现出了强劲的抗冲击力，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取得突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超过日本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①]从整体上看，中欧经贸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双方贸易稳步推进、迎难而上。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为 567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再从中国与欧盟主要国家层面的数据来看，贸易增长同样形势良好。2011 年，中德贸易额高达 16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8%；中何贸易额为 68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3%；中英贸易额为 5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2%；中意贸易额为 51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6%；中法贸易额为 52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

双向投资快速增长、潜力巨大。欧盟是中国累计第四大实际投资来源方，截至 2011 年底，欧盟在华直接投资项目 35104 个，实际投入 785.4 亿美元。其中，2011 年，欧盟在华直接投资项目 1743 个，实际投入 63.5 亿美元。[②]从 2011 年全年的外商投资企业数据来看，欧盟 27 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1743 家,同比增长 3.2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63.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65%。[③]这一数据排在香港、台湾之后，位居对华投资第三位。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也在近几年的时间里逐步发展起来，投资的规模和领域在不断扩大。截止到 2010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累计达 124.97 亿美元，实现了对欧盟所有国家的全覆盖。中国在该地区共开设了直投企业 1600 家，解决了 3.77 万人的就业问题。

技术合作有待加深、前景广阔。随着中欧科技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的科技交流与技术合作明显提升。作为中国技术合作与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方，欧盟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截止 2011 年 7 月，中国自欧盟引进技术 37424 项，累计合同金额 1396.56 亿美元。2011 年 1

---

①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谈 2011 年中欧关系》，载新华网，2012 年 1 月 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04/c_111370063.htm。

② 《中国同欧盟的关系》，载外交部，2012 年 7 月 20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oz/1206_46/sbgx/。

③ 《2011 年 1-12 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载商务部网站，2012 年 1 月 31 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m/201201/20120107943159.html。

至 7 月，中国自欧引进技术 1965 项，合同金额 47.86 亿美元。[①]中国在不断寻求与欧盟各国在技术上的合作共赢，然而受到欧盟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限制，中欧经济合作的深度依然不够，温家宝总理在 2011 年 5 月份参加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上也呼吁德方能推动欧盟放宽对华出口管制。这一政策严重制约着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和技术交流，它也是造成中欧双边贸易中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相对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中欧经贸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中欧贸易产品结构仍不平衡，中国对欧贸易顺差长期存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欧盟对华出口管制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向其购买高新技术产品及设备；其次，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各国也在适当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再次，中国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加强，在技术应用和产业升级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也使得中国在同类商品的竞争力上获得提升；再加上欧盟对华产业转移等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中欧贸易出现长期中方顺差的局面。然而，不可否认中欧之间确实存在产品结构不平衡的现象，根据商务部 2011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见表 1、表 2），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前五位与其对华出口商品的前五位中有三类商品相同，即：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而这三类产品中国均保持贸易顺差，特别是机电产品这一类顺差就达 1197.72 亿美元。2011 年中国出口欧盟 3560.2 亿美元，从欧盟进口 2111.9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4.4%和 25.4%，贸易顺差为 1448.3 亿美元。[②]面对居高不下的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欧盟内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明显加强，针对中国的出口商品频繁发难，加以制裁。进而加剧了双方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

表 1　2011 年欧盟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前五位）单位：百万美元

	机电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贱金属及制品	化工产品
进口额	190,633	52,090	35,827	26,386	16,808
占比	47%	12.8%	8.8%	6.5%	4.1%
占欧盟同类进口比	39.1%	40.2%	69.7%	17.9%	8.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数据编制，参见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28425，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28419。

表 2　2011 年欧盟对中国出口主要商品构成（前五位）单位：百万美元

	机电产品	运输设备	贱金属及制品	化工产品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出口额	70,861	42,674	16,404	15,894	9,546
占比	37.7%	22.7%	8.7%	8.5%	5.1%
占欧盟同类出口比	12%	13.6%	10.8%	5.1%	9.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数据编制，参见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

① 第五届蓝厅论坛外交部资料：《中国—欧盟合作成就展望》，第 8 页。
② 参见《中国同欧盟的关系》，载人民网，2012 年 4 月 1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242538/17697682.html。

209.asp?news_id=28424，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28418。

欧盟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势头有增无减，贸易摩擦愈加频繁。中国对欧盟的贸易存在较大的顺差这一客观事实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欧盟国家不断批评和指责中国通过向其倾销大量廉价产品来维持贸易顺差，欧盟对华反倾销的调查也随之增多。调查涉及中国对欧出口的众多行业和领域，而且金额也越来越大。欧盟曾于 2010 年 6 月份开始陆续发起针对我国产无线广域网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双反一保”的调查，这是欧盟首次同时对同一产品进行三种调查，这种做法甚至在 WTO 的案例中也数少见。这一调查也成为迄今以来针对我产品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案件。[①]在 2011 年，欧盟又对中国的商品进行了多次“双反”调查，涉及的产品包括：编织玻璃纤维、铝散热器、有机涂层板、铝箔卷、橘子罐头等。欧盟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对中国实行“双方”调查最多的经济体。欧盟的“双反”调查对涉案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国际合作及跨国投资等都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由于其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在调查过程中欧盟经常会加大对调查对象的举证责任和应诉负担，裁量时也存在较大的自由度。而这一问题仍将是中国企业对欧贸易中不得不去应对的难题。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合作深受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后不断放缓，欧盟的经济又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而再次下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上升，贸易政策上的自顾与自保倾向也趋于强烈。今年以来欧洲经济逐步被欧债危机推向冰冷深渊，但中欧贸易却增长迅速，凭着劳动力成本等竞争优势，中国出口的商品越来越多，但欧盟对此的抵制也越来越多。[②]为了保护本国经济以及降低失业率，未来一段时间，欧盟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仍然不会减退。通过增加关税、提高入市门槛以及各种贸易壁垒等手段，来对中国出口欧盟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干预，对中国的出口企业、海外跨国投资企业进行限制和打压。

中欧经济合作过程中政治化现象依然存在。在中欧经贸合作成绩显著的背后，双方仍无法化解已有矛盾和冲突。欧盟指责中国通过汇率补贴来有意增加贸易顺差，使得其不得不承担内部市场遭受冲击和失业率一再攀升的危险。同时，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等问题上表示不满，更有甚至指责这是中国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强调称，中欧应加强对话和磋商，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希望欧盟对中国的经济条件进行客观而不带偏见的评估，尽早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③]欧盟债务危机发生后，其中一些国家又开始借此炒作中国欲以救助欧盟为由来“漫天要价”。面对这一问题，中国外交副部长傅莹在蓝厅论坛上作出回应称，中国加强与欧洲的经济合作正是欧洲克服困难所迫切需要的，不要给这种正常、有益

[①] 《欧盟结束针对我数据卡的保障措施》，载欧盟经商处，2011 年 1 月 31 日，http://e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101/20110107387258.html。
[②] 孙韶华：《发展中国家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激增》，《经济参考报》2011 年 8 月 26 日，第 2 版。
[③] Wang Qishan,"Distant Neighbors",*The New York Times*,May 5, 2009.

而健康的交往扣上政治的帽子，不要将经济合作政治化。[①]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欧间经济问题政治化现象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在今后涉及双方贸易交往及争端解决的过程中，欧盟仍将利用这一手段来向中国施压。

三、全面推进中欧经贸合作的建议

中国与欧盟正处于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欧双方的经贸合作经受住了考验，贸易额保持着稳定、高速的增长。但不可否认，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整个欧盟面临着历史性难题。欧债危机不仅对欧洲经济复苏、欧元币值的稳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中欧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所以，如何面对危机、化解危机、利用危机将成为中欧双方共同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一）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从中欧关系来看，欧洲拥有地缘政治距离的优越条件。与美国及日本比较来看，欧洲国家在对华政策上整体呈现出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崛起在地区安全领域上带来的威胁并不十分关注。欧盟在涉及中国敏感的领土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不过多涉及，这是中欧关系能够得到长远发展的前提，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和巩固的基础。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减少双边贸易摩擦以及减少因偏见、误解而导致中欧双方的经济矛盾；同时对中欧各方经济发展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恢复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拓展合作领域。经贸合作上，双方应抓住时机，面对国际新形势下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在贸易、金融、环保、新能源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胡锦涛主席在 2011 年 5 月会见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时称，中欧在经济合作上应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着力推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②]欧盟各国也可根据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需求等具体情况开展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合作，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推动双方贸易朝向便利化、自由化方向发展的投资促进政策。

（三）促进投资便利化。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速整体加快。从商务部公布的《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201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746.5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8.5%。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完成 75.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③]在这一个过程中，中国对欧盟的投资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单从规模上来看并不很大，但其增长速度十分迅猛。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对华投资的便利化，在金融危机时期，在华投资成为欧盟跨国公司维持盈利和度过生存难关的重要支撑。相比中国而言，欧盟反而没有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提供更多便利化条件，而是通过提高各类入市门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来限制中国企业赴欧投资。

[①] 《中欧伙伴关系迎难而进》，载外交部网站，2011 年 12 月 2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883744.htm。

[②] 《胡锦涛晤范龙佩 促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载中国新闻网，2011 年 5 月 16 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1/05-16/3044550.shtml。

[③] 《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2012 年 9 月 2 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209/20120908317332.html。

（四）推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目前除了欧盟、美国、日本等 30 多个全球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外，绝大多国家已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至今没有承认，这将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长远发展。欧盟想以此来打“政治牌”，无疑是在消耗双边经贸合作所创造的红利。对于欧盟来讲，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直接利益是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促进竞争；更长远的利益在于摈弃一种歧视性的遏制他方发展的思维方式，转而寻求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道路。[①]

四、面向未来的中欧经贸关系展望

2012 年是中国加入 WTO 新十年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第十二个年头。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仍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扩大技术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这不仅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更为中欧经贸发展的光明未来增添了强心剂，中欧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中欧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增长势头依然强劲。2012 年，欧债危机仍然将对欧洲的经济复苏带来影响，也会对全球股市、贸易带来局部和短期的震荡。但中欧贸易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中国将稳居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随着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也在加快，对外产业结构、贸易结构逐步升级，未来 5 年中国的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达到 8 万亿美元，中国的市场规模将给欧盟带来巨大的商机。与此同时，“欧盟 2020 战略”也为中欧的经贸合作创造了新机遇、新领域、新方式，这些都将为中欧双边贸易额的大幅提升注入强劲的动力。

中欧经贸关系将稳步提升，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深化。双方将会积极巩固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基于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中欧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双方的经贸交往。中国将继续加强与欧盟经贸领域的合作，这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中欧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欧盟的资本、商品、市场和先进的技术、专利及服务理念对中国加快产业升级和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恰逢多国与中国建交庆祝年，政治互动将有力推动经贸合作。2012 年将迎来中国与英国、荷兰、希腊、德国、卢森堡等欧盟国家建交四十周年，作为欧盟重要的国家，德国是中国在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荷兰自 2003 年起一直保持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则位居德、荷之后排名第三。中国将与这些国家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来纪念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回顾成就的同时，双方也将就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寄予良好的期望。在这一年中，政治交往与互动愈加频繁，领导人的会晤及互访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也将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而这将有利于中国

[①] 《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共赢》，载新华网，2011 年 12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2/06/c_111221810.htm。

巩固与欧盟重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这也为中欧经贸合作的不断加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世界民粹主义趋势透析

史志钦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是欧洲民族主义课题研究成果之一，清华大学国关系硕士生袁昊对此文亦有贡献

载于《人民论坛》2013 年第 3 期

政治过程中的民粹主义趋势正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悄然形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民粹化现象将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的发展

2012 年，民粹主义的最突出表现是各国政坛的右倾化现象，“草根型”政治领导人借助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打着人民至上的口号，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在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甚至上台执政。在表达方式上，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激进和暴力化的方式表达对某一方面问题的不满和内心的诉求，而非诉诸于本国已有的制度渠道。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民粹化现象将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的发展。

欧洲社会情绪的民粹倾向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实力壮大

在欧洲，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社会情绪的民粹倾向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实力壮大。在社会情绪上，欧洲社会在移民问题上的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思想蔓延，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

在一些国家，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极右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一些民粹主义政党上升为全国第三甚至是第二大政党，在议会格局中形成左、右和极右三组鼎立的趋势。例如，让·玛丽·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长期是法国第三大政党;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长期主政意大利，贝卢斯科尼三次担任政府总理;比利时的佛拉芒集团已经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丹麦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匈牙利约比克党都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挪威进步党在 2009 年 9 月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二大政党。2011 年 3 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警告说，由荷兰向东北方向呈弧形纵深的一系列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势力正在政治上突破束缚，吸引越来越多的选民。

拉美的民粹主义更多体现为左翼特色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拉美就成为了民粹主义的乐土。长期以来，该地区经济上依附于美国而发展，民粹+民族主义模式成为该地区政治文化中的突出特点，受依附理论的影响，不少政治家将拉美地区自 1980 年代出现的经济滞涨现象归咎于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制。拉美地区的左翼政党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进入新世纪以来，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多由左派政治家领导，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就是典型代表。除此之外，包括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和巴拉圭的卢戈等人，其竞选纲领和实施国家政策时，也都带有很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

日本的右翼民粹主义趋势更趋凸显

近年来，日本的右翼民粹主义趋势也更趋凸显，其典型代表既有右翼元老石原慎太郎，又有右翼新生代代表桥下彻。2012 年 4 月以来，石原一手操弄的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使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在钓鱼岛争端尘埃未定之时，日本政坛再出民粹主义新秀。

2012 年 9 月 12 日，43 岁的大阪市长桥下彻宣布成立新的全国性政党“日本维新会”。桥下之所以受到欢迎，重要原因是他善于解读当前日本“保守”的主流空气，敢于以粗线条的作风向战后民主主义的基调挑战，进而博得政界与财界的鹰派大声叫好。他善于抓住福岛核电站灾难后在日本出现的“恐核”的心理，提出要逐步摆脱核电站的主张，迎合了民众的心理。

作为日本政坛右倾化的表现之一，桥下彻在政治上明显属于保守的民粹主义者。在经济上，桥下彻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激进路线，主张扫除现存的政治秩序。在风格上，他擅长于将复杂问题成因简单化，通过用单一的解决手段来赢得选民的支持。因此，作为草根出身，敢言易怒，没有背景的桥下彻显然比传统的日本政治官僚更容易赢得民众的好感;革命式的变革方式及对现行体制的强有力批判，给日本政坛带来了一股强有力的冲击。2012 年 12 月 16 日，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桥下彻领导的维新会获得 54 个议席，成为继自民党、民主党之后的日本政治第三极。

印度政坛上的民粹主义开始得势

在印度，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其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印度政坛上的民粹主义也开始得势。印度的民粹主义政党主要为草根国大党，其党主席为班纳吉。草根国大党作为主要的民粹主义政党，近年来在印度政坛上升势头很快，其在联邦议会大选中从 2004 年的 2 席迅速蹿升至 2009 年的 19 席;2011 年，草根国大党与国大党结盟，一举战胜了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 34 年之久的印度共产党，获得了该邦执政权。尽管作为国大党的主要联盟，但是自 2011 年底以来，印度政府的多项改革计划搁浅，这其中阻挠改革的除了主要反对党人民党外，还包括了国大党的主要盟友草根国大党。

2012 年 9 月 18 日，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席邦长、草根国大党主席班纳吉宣布，该党将退出执政的国大党团结进步联盟，以抗议辛格政府宣布的经济改革方案。这也使得国大党在议会成为少数派，进一步加大了国大党继续执政的难度。伴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印度的民粹主义正在伴随着印度政坛碎片化而势力持续增长。

俄罗斯普京式的民粹主义

“给我 20 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是俄罗斯普京式的民粹主义语言风格。凭借着在车臣地区的平叛成功，普京挟民意登上总统宝座，在最初的 8 年总统任期中带领俄罗斯走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创造了俄罗斯经济奇迹，同时也成功地培育了自身的个人权威。2012 年 3 月，俄罗斯政坛强人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开启了自己总统生涯的第三个任期。

尽管 2011 年底开始俄国杜马的活动开始活跃，俄罗斯国内的中产阶级今年年初也出现了反政府游行，但是普京通过发起民粹主义竞选活动，承诺提高公共部门工资和大幅增加军费支出后，仍然顺利获得了选举。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财政赤字的压力和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普京政府的民粹主义色彩有可能有所淡化，但是作为威权型政府的领导人，新一届俄罗斯政府民粹主义色彩仍然鲜明。

民粹主义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尽管当今世界政治中的这股民粹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底层民众的诉求和对社会的不满，促使主流政党思考全球化时代下的国家政策，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民粹主义对于人民至上理念的极端强调实际上是对民主制度的践踏，对于体制的怀疑态度使其更有可能走向反体制的道路，从而背离民主，走向独裁主义统治。

其次，民粹主义将社会问题解决单一化、简单化，而这种解决方式往往具有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排外主义特点，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最后，民粹主义对于社会强烈的批判意识往往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其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很容易陷入非理性的逻辑中，从而出现集体无意识，在国家决策中容易走向盲目极端化的道路。这对于当前处于深刻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也具有深远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英国政府主导“第二次城市化”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载于《人民论坛》2013 年第 4 期

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划和疏导，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人口分布严重失衡

先放任自流然后治理改造的模式存在很多缺陷

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工业革命拉动下实现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原动力。以工业化拉动城市化，政府干预较少，使得英国城市主要围绕着资源和市场等因素自然发展起来，各个城市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功能上各具特色，在形成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里兹等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同时，出现了一批分别以纺织、工矿、港口、海滨、交通枢纽和商业为主要功能的中小型城市，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群和城市带。

但是，这种“放任式发展”的模式也给英国城市化带来很多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划和疏导，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人口分布严重失衡，多数人口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的情况。

政府主导“第二次城市化”

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启动了国家投资的“新城(new towns)开发运动”，标志着该国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城市化”。

1945 年，英国中央政府依据“新城法”拨款建立“新城开发公司”，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城市。开发公司的资金完全来自中央政府，通过中央统一基金提供预付款项，通过城市设施租售分期偿还。1946 年，新城开发公司在伦敦北部 40 公里处建造第一个新城斯戴藩(Stevenage)，人口规模 10 万。按照这种思路，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英国已经建立了 33 个新城。据统计，上世纪 90 年代初英国的城市人口为全国人口的 90%，其中的 23%居住在政府规划和建设的各种不同规模的新城里。1979 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认为新城开发运动有国家过度干预之嫌，在第三期开发项目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紧急叫停。1990 年，新城开发公司解散，由“英格兰工业房地产公司”处理善后事宜。

1997 年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后，提出“在新千年里，政府的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复兴，这是第二次现代化和城市化”。布莱尔工党政府重提“第二次城市化”概念，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进行了调整。按照他的理念，政府主要不应该作为投资者和建设者介入新兴城市开发，而应该用政策手段引导和促进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通过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让高速火车、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科技协作、远程医疗等以往无法想象的技术进步推动城市周边地区的发展。2007 年布朗上台后，承诺在三年内斥资 100 亿英镑，建造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住房”。这些工程将遵循环保原则，实行严格的建筑标准以使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最低。同时，布朗政府还准备在一些废弃或闲置的“褐色地带”新建住房，在保护大城市郊区生态环境的同时切实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布朗的这种举措可以被理解为英国第二次城市化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推动各个城市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重新进行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如伦敦东部原来是传统制造业、制衣业的基地，在英国中央政府的指导下，该地区利用欧盟援助，大力创建小科技公司，统筹规划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格拉斯哥原来是苏格兰的汽车制造、船舶制造基地，经规划，在原造船基地上建设了科技公司和通讯交换中心。传统工业的更新和新兴产业的出现，使曼彻斯特这样的重工业城市在交通、通讯、能源等方面都面临挑

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曼城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办法，目前已建成年吞吐量达 1850 万人次的现代化机场，拥有大西洋至英国海底光缆周转通讯枢纽，使这个老工业城市重新具备了发展的潜力。

进退两难的救助方案

陈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载于《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6 日第 21 版

根据塞浦路斯和欧盟达成的新协议，塞浦路斯将对该国第二大银行大众银行进行拆分，其存款中 10 万欧元以下部分将被转至塞浦路斯银行，10 万欧元以上存款将被冻结并大部分用以偿债。塞浦路斯银行的账户中存款超过 10 万欧元者将可能被强制减记 40%。

新的救助方案放弃了原计划中对所有储户开征存款税的方式，转而将重点放在对塞浦路斯两家最大银行进行重组上，但塞浦路斯经济前景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救助计划明显有挤掉塞浦路斯金融业泡沫的意图。金融业是塞浦路斯经济的“半壁江山”，在这次重组中，塞浦路斯两大银行的股东以及债券持有人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重组的打击下，有可能会动摇塞浦路斯金融业发展的信心。据欧元区集团的乐观估计，塞浦路斯金融业要到 2018 年才能恢复到欧元区的平均水平。

第二，伴随着救助计划的实施，塞浦路斯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金融业和旅游业是塞浦路斯的两大经济支柱。金融业泡沫的破碎，将给该国旅游服务业带来巨大冲击。欧盟委员会已经把对 2013 年塞浦路斯的经济预测从-1.7%降至-3.5%。

第三，储户的信心如何恢复？从表面上看，10 万欧元以下的小储户利益得到了保护，但如果塞浦路斯接受救助后经济衰退程度超出预期，塞浦路斯无法筹措到所需资金，10 万欧元这一界限有可能被重新界定。

第四，紧缩计划的实施能否得到议会支持？塞浦路斯议会此前通过了有关银行重组的法案，因此，现在对两大银行的重组不需要重新得到议会的批准。但伴随着救助方案而来的是一揽子紧缩计划，这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因此，塞浦路斯是否会步希腊后尘，依然牵动欧元区的神经。

其实，无论新的救助方案如何构建，对塞浦路斯来说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全输的局面。银行业重组将使塞浦路斯“避税天堂”的信誉受到重创，这对依赖金融业发展的塞浦路斯无疑是釜底抽薪。如果拒绝救助，又无法筹集所需的自救资金，塞浦路斯则面临国家破产的危机。

对于欧元区来说，塞浦路斯救助方案一改再改，尤其是一开始出台的存款税更是在市场上激起了千层浪，欧元区费了大力气才缓慢恢复的公信力再次遭到破坏。

欧债危机已经从主权债务危机向银行业危机的方向发展。欧盟对西班牙采取的是直接救助银行的方式，而针对塞浦路斯的新救助计划则是采取银行重组的方式，并且由银行股东、债权人和大额储户承担损失。这种“塞浦路斯式”的银行重组是欧债危机中的特例，还是可能成为欧元区银行业应对危机的新标杆？市场正在观察。尤其是对于银行的股东、债券持有人以及大额储户来说，塞浦路斯的做法是否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进而出现投资者从欧元区“胜利大逃亡”的局面，尚未可知。

目前，塞浦路斯的银行仍未开业，资本管控也还没有取消。如果银行重新开业后出现大规模挤兑，取消管控后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那么，塞浦路斯的局势必然又会面临新的变数。

纠结在民主与欧元之间的意大利

陈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网站

民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欧元故，两者能否抛？

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尤其是债台高筑的欧洲南部国家来说，本来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大选，但由于货币主权的让渡，意大利的这场选举不仅会给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欧元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欧元已经不仅是货币的符号，而且还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含义和责任。

意大利的一些政治家们在这次大选中显然利用了民主，渲染了自由，但抛弃了欧元。一些政治家竞选纲领中不切实际的承诺可以赢得选票，但由于与欧元区的改革方向反其道而行之，这将会给欧元以及欧元区的经济带来动荡，进而危机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

意大利部分选民们显然在民主、自由和欧元之间也选择了放弃承担责任。谁都不愿意过紧缩的生活，但寄希望于依靠政治家们不靠谱的承诺来改变紧缩的生活，到头来只能面对更漫长的紧缩，并祸及其他欧元区成员国。

民主和自由在经济发展时可以成为政治生活的正能量，但在经济衰退乃至危机时，则可能会成为政治生活的负能量。这种事例在欧洲的历史中信手可拈。而欧债危机三年多的演变表明，欧元区成员国在行使本国的小民主和小自由的权利时，如果正确对待超国家货币欧元所涵盖的大民主和大自由，欧元区的形势就会趋稳，反之，则是动荡。

选举变为市场拍卖，欧债危机暴露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困境

史志钦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载于宣讲家网站

http://www.xj71.com/2013/0316/706632.shtml

西方国家的选举正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市场拍卖，一些政客为一味地迎合选民不断许下承诺，最终被民意所劫持，结果造成国家错失改革良机，走到破产的边缘。世界各国在制度选择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只有选择一种与其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传统相适应政治制度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长期以来，以西欧为代表的议会民主制度一直被西方学者和政客认为是人类社会迄今最为完美、最具生命力的制度，是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值得学习和效法的榜样。然而，一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则暴露出了这种制度的弊端和缺陷。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在欧洲的变种，其实质是政府公共债务严重超出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造成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危机从希腊为代表的所谓“欧洲猪国”开始，随后逐步波及到其他国家，使得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人类未来发展模式顿时黯然失色，“欧洲崩溃论”也一度甚嚣尘上。

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各国政治危机不断。由于各党派之间政见分歧严重，一些国家政府组建过程要么困难重重，要么是最终建立了脆弱的联合政府。从 2009 年危机爆发至今，欧盟内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政府，或引咎辞职、或解散政府与议会而提前选举。2012 年 5 月至 6 月，希腊先后举行两次选举，才最终勉强组成联合政府。面对危机的冲击，西班牙也产生了爆发宪政危机的危险。西班牙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地区——加泰罗尼亚，坚持要求举行自治独立的全民公投。在法国，力争要与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比高低的总统萨科齐因解决危机不利而黯然离去，大有英雄壮志未酬之悲怆。

最引人关注的是前不久举行的意大利议会选举，贝尔萨尼领导的中左联盟与贝卢斯科尼的中右联盟难分伯仲，喜剧明星贝佩·格里洛领导、成立不到五年的“五星运动党”异军突起，不仅在众议院收获 25.5%的选票，还在参议院选举中抢下超过 50 席，使意大利政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鉴于欧债危机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意大利又是欧元区经济规模最大的重债国，目前的政治僵局势必然会给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带来诸多不确定影响。

债务危机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各国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以“最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傲，这些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涵盖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然而，一场危机袭来，巨额赤字赫然显现，欧洲各国忽然集

体发现，他们已负担不了如此慷慨的福利了。各国的应对措施无外乎是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社会福利保障，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滑坡，失业率不断攀升，引发社会普遍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对立和政治极端行为日渐凸显。发生在挪威奥斯陆的爆炸和于特岛的枪击事件、英国伦敦的社会骚乱、法国青年的连环枪击案、德国出现的新型极右翼政党，再到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引发世界各地的抗议银行大公司贪婪和财政紧缩政策的示威游行等，无不反映出西方社会积累已久的社会痼疾。

在观察人士看来，正是高福利制度为政府制造了高额的债务，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欧洲才有出路。然而，伦敦的游行、雅典的罢工、巴塞罗那的抗议以及罗马的骚乱，无一不显示欧洲国家进退两难的困境。对意大利进行实质性改革并取得效果的蒙蒂政府，被选民无情地抛弃实，再次证明了“谁改革，谁下台”的严酷政治现实。

欧债危机在一些国家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清晰地暴露出欧洲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接二连三的选举，不仅费时耗力，挥霍巨额的资金，而且也未能解决各国迫在眉睫的问题，选举结果更多呈现的是社会的分歧和民意的纷乱。实质上，西方国家的选举正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市场拍卖，政客们为赢得选举而沦为“选票的绵羊”。一些政客为一味地迎合选民的要求，不断许下承诺，最终被民意所劫持，结果造成国家错失改革良机，走到破产的边缘。

欧洲的制度实践及其呈现的乱象再次证明，世界各国在制度选择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只有选择一种与其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传统相适应政治制度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学术园地]

“中国-欧盟：文化与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袁帅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博士后

2013 年 3 月 28 日，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持了“中国-欧盟：文化与外交”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的主题发言人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房乐宪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评论人有清华大学中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国学者潘鸣啸博士，外交部欧洲司综合处郑立樵处长，《中国社会科学》国际部主任范勇鹏博士。

时殷弘教授阐述了中国和西方对国家主权、国家平等和民主平等问题的不同理解，这些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国际干涉行为以及人权范围。随着时代发展，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秉承国家主权至上和反干涉的原则，在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保持着自身的灵活性。西方的经典自由主义者和经典现实主义者对于国际干涉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各自有着明确的条件限制。

黄裕生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人权绝对性与国家主权的限度”，其中主要包含四个问题：人权普遍性的根据是什么；作为有绝对权利的个体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人权是否可以成为民族和国家的理论基础；实现人权的文化研究。黄裕生教授还就人权原则与民族国家的原则的区别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我们通常的观念中，人权原则跟民族主义国家的原则是一致的，是为民族主义国家提供基础的。

房乐宪教授分析了欧盟近几年的文化外交政策，概括了现有欧盟对外政策框架当中文化层面的主要体现，并归纳出这些文化内容的特点。欧盟推动文化对话和交流进程的目的之一是促进保护和尊重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文化因素正在更为密切地结合到欧盟整体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中。在全方位的文化外交基础上，欧盟的政策重心转向重视新兴发展中国家。

针对上述发言人的主讲内容，法国学者潘鸣啸博士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他认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除了对国家主权的绝对重视，还无法回避国内的革命运动，因此反对干涉是针对外部的侵害。而谈到中欧间的文化交流，欧洲更倾向于民间交往，重视人与人的沟通，这是保持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方法。郑立樵处长从自身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出发，探讨了文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几点影响：第一，中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双方的外交思维和政策是有影响的。第二，文化是很宽泛的概念，无论历史传承、哲学思想，还是意识形态都与外交相关。第三，不能忽视的是中欧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相通和共融的地方，中欧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也都有文化自信。第四，文化现在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潜力所在。总之，重视文化是促进中欧发展的关键渠道。中国对欧盟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范勇鹏主任对人权和文化等问题做了一定的归纳，他认为从宏观上来看，有关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争议是需要长时间探讨才能得以解决的难题，关乎每个人生死的事情宁可选择保守也不要过于激进。

讨论结束后，主持人张利华教授对本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文化价值观差异所引发的中欧关于国际干涉等问题的争论仍然会继续，值得学者以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视角加以认知，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共同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立场”学术研讨会综述

许宛伶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生

2013 年 4 月 8 日，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主持了“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立场”学术研讨会，来自波兰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师拉斐尔· 乌拉托夫斯基（Rafal Ulatowski）博士做了主题发言。会议邀请到的评论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江时学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讲师唐晓阳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首席风险分析师赵昌会先生，与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乌拉托夫斯基博士首先认为，欧债危机不仅只是暴露了欧洲金融制度的缺陷，更凸显了欧洲一体化背后的政治角力赛，这方面可以从德国的表现与决策中窥见一二。危机发展以来已经出台不少政策方案，德国在这些政策提案上的举棋不定，或是独排众议，都显示过去三年来德国在处理欧债危机问题的立场与决策上缺乏一致性与远景。例如，2010 欧洲提出发行“欧洲债券”方案，德国默克尔总理始终表示反对，认为在没有可靠的财政联盟下，欧洲债券不能有效解决欧债危机。又例如在是否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介入欧债危机拯救上，德国立场一再变化：2010 年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认为欧洲可以自行解决问题，并提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默克尔总理也相当支持该立场，然而现在德国又力促将 IMF 纳入救援方案中，反映出德国希望能在财政紧缩政策上缩减其承担的角色。又如关于退出欧元区方案上，德国在 2010 年时还表示未能履行其成员国义务者当退出欧元区，直到 2012 年当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性大增时，德国又改变其观点。在希腊、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纾困方案上，德国的立场也时常摇摆，使得这些国家无所适从。

江时学研究员认为在分析欧债问题时也必须考虑到国内政治因素。郇庆治教授认为，德国国内人民对于政府在危机处理与政策制定上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立场上的变动。唐晓阳老师也提到从纾困方案可以看出国家利益与欧洲利益间的权衡与角力，反映出欧洲一体化以来，主权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关注的焦点。赵昌会先生认为，欧洲的改革尚未启动，只是推出了财政紧缩政策，该政策还引来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各种所谓的解决方案多来自成员国中相对稳定国家，忽视了成员国中“问题国家”的观点，至今也少有听闻这些问题国家对于脱困办法中是否有提出建设性提案。

乌拉托夫斯基认为，欧洲仍有一段长远的改革路途，包含三方面，分别是加强欧洲成员国经济政策的监管、强化新的欧洲金融支柱＂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以及金融市场的监管。这些改革能否取得成效，有赖欧洲国家形成共识与合作意愿，而欧债危机发展以来，德国倾向采取政府间合作模式，尽管德国与法国的合作模式提供欧洲一个解决其问题的机会，欧元区中仍存在对德国的不信任感。若欧债问题不能得到缓解，德国的核心利益也将受到影响。

“中东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与发展”学术报告会综述

许宛伶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生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邀请的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拉斐尔·乌拉托夫斯基(Dr. Rafal Ulatowski)博士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清华国际关系学系《新知论坛》就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做了一次专题讲座。乌拉托夫斯基介绍了中东欧十个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经贸合作的现况，并特别论及了中国企业在波兰投资承揽项目的问题。

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双边经贸合作发展，是在 2008 年与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展开的。金融危机意味着西欧市场需求锐减，额外的投资来源停滞，迫使中东欧各国寻求其他合作贸易伙伴，对中东欧来说中国是个潜在的合作对象；对中国而言，美国与西欧深陷危机之中，尽管中东欧市场不如西欧，但它们相对稳定，可以提供新的合作机会与贸易发展。

乌拉托夫斯基介绍了双方官方层级的互动，包括 2011 年在匈牙利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与中东欧经济与贸易论坛，2012 年于华沙举办的第二次论坛。2012 年中国与波兰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主要考虑波兰在中东欧国家相对比较大，波兰与西欧各国的友好关系有利于中国在欧洲的经贸发展与投资。波兰在中波战略伙伴关系中强调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在经济方面，波兰积极协调中东欧其他各国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认为将中东欧做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开展合作，可以平衡双方关系；在文化交流方面，波兰高等院校陆续开办汉语课，鼓励其学者或学生来华学习交流，加深双方的理解与认同。

就中国企业在中东欧的发展上，乌拉托夫斯基举出建设采购案的例子。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能以低成本取得公共采购案，但由于不熟悉欧盟各项法规，加上语言沟通与文化交流上的误解，导致一些合作纠纷。例如中国海外工程公司(COVEC)在波兰的高速公路建设采购案中，以低于波兰政府预算的 50%取得工程案，但因成本的估算未透彻考虑到欧盟规范与市场价格浮动的因素，以及文化上的误解、疏于和其他合作公司沟通、欠缺与波兰各方利益相关者沟通等，使该工程案以失败告终，双方不欢而散。通过此一案例，双方皆意识到理解彼此文化以及不断沟通和互动的重要性。最后，乌拉托夫斯基教授认为，中东欧与中国的经贸交流的前景是乐观的，而中国企业也会接受在波兰投资承担工程的教训。

这次讲座从中东欧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有新的认识，从波兰人的视角剖析了中国企业在波兰投资承揽工程的问题，使大家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方面的动态，也可以为未来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的提供借鉴和参考。